

# “青马”军阀统治与民国时期河西毒品泛滥<sup>\*</sup>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1931—1942年,“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扎大量军队,为筹措军费,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和摊款,河西烟毒由此泛滥,成为甘肃省第一大鸦片产区。在“青马”军阀的抵制下,河西“禁政”倍受阻挠,效果不彰。“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河西为所欲为,是中央权威缺失,对地方实力派控制乏力所致。

**关键词:**“青马”军阀;河西走廊;毒品;禁政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8)04-0091-04

马家军阀是近代兴起于西北的主要地方实力派,对近代甘宁青的政局影响甚大。1931—1942年,青海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简称“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军长达10年之久,掌握着地方政治实权和经济命脉。甘肃省“政府对之,无绝对支配力量。最好的场合,不过办带面子上的敷衍而已”<sup>[1]</sup>。河西地区由此成了“青马”军阀的外府,在此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烟亩罚款,遗害累累,民不聊生。

## 一、“青马”军阀掌控下的河西毒品泛滥

“青马”军阀在河西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军费由河西各县负担。仅仅依靠田赋很难维持大量的军费开

支,青马军阀遂把主要目标放到鸦片的种植和贩卖上。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以资挹注军费。在此情势下,河西地区的毒品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成为甘肃省最大的毒品产区。

河西地区毒品种植泛滥,时人多有记载。高良佐在永登看见“四郊叶绿短茎、弥漫畦圃者,皆罌粟也”<sup>[2]58</sup>;过临泽时,“一路罌花怒放”<sup>[2]180</sup>;从永昌到武威途中又见“罌花盛开,宛如芙蓉,而绚烂过之”<sup>[2]181-182</sup>。刘文海从酒泉赴张掖途中,见“遍地麦穗如金,罌花似锦”<sup>[3]19</sup>,高台县“良田遍植罌粟”<sup>[3]21</sup>。不难看出,河西大片良田已为成片的罌粟占据。

表1 1934年河西各县种烟亩数及产额统计表

县名	种烟亩数	每年烟土产量	县名	种烟亩数	每年烟土产量
武威	83333	2500000	民乐	2533	76000
张掖	46666	1400000	山丹	3021	90650
永昌	2833	85000	酒泉	9016	270500
民勤	1636	49100	金塔	2000	60000
古浪	16133	484000	鼎新	禁绝区域	
永登	26666	800000	安西	433	13000
高台	4208	126252	玉门	4000	120000
临泽	3333	100000	敦煌	6133	184000
总产量	211944	6358502			

注:种烟亩数以亩为单位,产烟额以两为单位;每亩均以30两平均计算。

资料来源:《1934年甘肃省种烟亩数及产烟额统计表》,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根据表1,1934年,甘肃省河西地区的16个县中,除鼎新县为禁绝区域外,其余15县均有鸦片种植,种植总亩数为211944亩,占全省总种植亩数

493315亩的43%,产量6358502两,占全省总产量14800000两的43%。在该年全省64个种烟县中,种植面积居前5位者河西就占有3县,分别是武威、张掖

\* 收稿日期:2008-03-20

基金项目:2007年甘肃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失控:民国甘肃禁毒研究”。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男,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近代西北开发史。

和永登。武威县种植亩数高达83333亩,居第一位。可见,河西的毒品种植无论在亩数上,还是在产量上都位居甘肃省前列。

河西地区成为甘肃第一烟大区,除了鸦片能治疗疾病,且便于运输,可充当货币换取外来商品等因素外,根本的原因是军阀的强迫种植以征收烟亩罚款使然。

表2 1934年河西各县烟亩罚款数目表 单位:洋

武威	320000	高台	70000
张掖	240000	山丹	100000
永昌	48000	民乐	55000
民勤	24000	酒泉	70000
古浪	90000	金塔	40000
永登	160000	敦煌	40000
临泽	70000	总计	1327000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摘要报告》,1936年,第31-32页。

烟亩罚款是河西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34年甘肃省58县烟亩罚款总数为4524000元,河西各县罚款占到总数的29%。该年的罚款大县为皋兰、武威、靖远、天水和张掖5县,罚款均在20万元以上,武威高达32万元。实际上,烟亩罚款的征收往往超过表2额定数字。如金塔县1933年罚款额定为39000元,而实拨付至50000元。1934年额定为40000元,而在上半年农民烟土未收时,就已经拨付支解30000元以上<sup>[4]</sup>。农民除承担此巨款外,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摊款,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生计维艰,不得不离村外逃。

## 二、毒品与河西农村经济之衰落

美国人罗斯认为,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或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的商业地区的产品”<sup>[5]</sup>。的确,撇开鸦片是毒品这一层不说,鸦片对于缺少其它经济基础的西部省区来说,是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商品。张掖“所产的鸦片,横越巴丹吉林沙漠,远销归遂(绥),再由归遂运回京广百货”<sup>[6]</sup>。张掖如此,靠鸦片贩运维持地方经济的武威、酒泉等县莫不如此。可以说,河西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日用品都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烟大县,每年鸦片收割之时,地方经济迅速“复活”,“繁荣”一时。武威“为西路鸦片之集中地,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连袂而来,为西路所未有”<sup>[7]172</sup>。

鸦片虽说给地方经济以刺激,使其“繁荣”,然而这种“繁荣”是短暂的、畸形的。凡是依靠鸦片支持地方经济的县份,在鸦片收割季节一过,禁政比较严厉

或是销售市场萎缩时,必然会出现经济萧条局面。1940年4月,甘肃省开始存土登记,一些烟土销售大县立即出现了市面呆滞,银根吃紧现象。酒泉县即是如此,该县7-10月市面资金都呈“纯紧”状态,缘由是“因禁烟关系占用资金,市面呆滞”<sup>[8]</sup>。总之,将鸦片作为维持地方经济主导性产业的河西各县,在鸦片市场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地方经济均陷入了破产不堪的境地。

河西各县受鸦片的祸害至深且巨。首先,种植鸦片需要上好的土地,河西走廊的沃土被毒品侵占,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粮食总产量减少,粮价上涨,老百姓无力购买,农家生计日窘,农民普遍“过着非人的生活……吃的是洋芋杂粮,有时还上观音土”<sup>[9]</sup>。其次,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但是,河西地区由于沉重的烟亩罚款和无休止的摊款,使得农民“视土地为累害,多相率弃地逃亡”<sup>[10]</sup>。临泽威狄堡为一大镇子,“居民旧有一千余户,迭经兵乱灾害,老死壮逃,今仅六、七百户。逃户粮赋,加由未逃户口负责,于是痛苦益深,相继逃亡者亦益多。”<sup>[7]170</sup>随着农民的逃亡,土地的抛荒,农村经济萧条不振。被推出故土的农民,一些进入城市谋生,加剧了城市的生存压力。一些进入军队,暂求温饱,更有一部分变成土匪,蹂躏乡里。

有种植,就有吸食,众多吸食者的存在,又给这个原本脆弱不堪的社会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衰落。河西各县的毒品吸食人数,据1939年统计,共有烟民46715人,占全省烟民总数194376人的24%<sup>[11]</sup>。吸食鸦片成瘾后,身心俱废,使社会生产受到打击。敦煌“当地的汉人,无论穷富老少、种田人、商人和手工匠,只要鸦片烟枪在手,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因此一天一天的堕落下”<sup>[12]</sup>。总之,“吸食鸦片者之增加若干分,即从事生产者之减少若干分”<sup>[13]</sup>。受长期吸食烟毒的影响,农人减少了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影响农村经济匪浅。

## 三、“青马”军阀掣肘下之河西禁政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一度宣称与鸦片势不两立,决心根除净尽。1935年到1940年国民政府实施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可视之为国民政府统治期内最大规模的禁烟运动。甘肃省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分期禁绝毒品,河西地区也纳入了禁绝范围。但是,“青马”军阀将河西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鸦片又是其主要财源,该地的禁政受其左右自是不免。甘肃省政府虽说在此地所费心思甚多,但收效甚微。诚如有人指出的,“省政府虽然一直试图实行

一项禁绝鸦片的政策。可是，鸦片交易主要操纵在到处都存在而且非常有势力的秘密社团手里”<sup>[14]</sup>。

1940年10月甘肃省组织了禁烟检查团，分四组对全省的禁政效果进行全面检举评估。第四组负责检查河西地区，从组长戴建标的呈文中，可看出当时河西禁政的各种面相及推行禁政的难度。

在禁种方面，马步青声称：“河西各县烟苗，早于二十七年，遵照中央命令，提前禁绝已两年，无一茎一苗发现。所有禁种工作，可负完全责任”。戴建标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受驻军的协助，禁种效果非常明显”。可见，河西的禁种的确取得了效果。令人困惑的是，河西在禁种之前为甘肃重要产烟区，烟土充斥于途，是地方军阀谋取财源的重要手段，但为什么此地的鸦片种植能很快绝灭呢？戴建标给出的解释是：“传说驻军当局听某谋士之建议，河西各县遵令禁种，一方面可以取得中央好感，一方面境内积存过剩之烟土，不出一年，烟价骤然增涨，再将民间存土集中起来，定可获利倍蓰。”此种猜测虽无其它材料可以佐证，但揆诸当时“青马”军阀聚集烟土，贩运买卖的事实也有一定道理。

在禁吸方面，戴建标指出，河西各县局办理禁吸均不认真：“（一）办理烟民登记时，凡有权势之烟民，均未登入，以致遗漏烟民甚多；（二）施戒时，大都入戒烟所几天，甚至有不住所内，每天仅到所一次，以致未戒妥者，约在半数以上；（三）县结自戒者，不过做一道手续，仍吸食如故；（四）对于办理烟民调验所情形，省府规定，凡烟民满三千名之县，始能设调验所，故烟民未及三千名之县，迄今未办烟民之调验，又即已经办理调验所之县，仍故意不调烟民入所调验，或虽形式上调烟民调验，查其实际，所填烟民调验鉴定书，在数百烟民中，竟无一人犯复吸者，如此敷衍了事之县，亦比比皆是”<sup>[15]</sup>。如永昌县登记烟民共在3000名以上，大都为贫民与苦力，一般有钱有势之烟民，均未登入，甚至“有父亲吸烟，以不吸烟之儿子代替登入烟民册者”。登记在册的烟民入戒烟所施戒一两天，托人说情即可出所，“故未戒妥者甚多”。戴建标对此地戒绝的烟民分别抽样调验，发现竟有3/10的烟民有复吸现象<sup>[16]</sup>。

在禁运禁售方面，戴建标给民政厅的呈文中写道：“各县局对于禁运禁售，向来抱不问态度，故对于运售甚少案破获，而经营运售之人，为特殊情形方面所派遣”<sup>[15]</sup>。此处所谓“特殊情形”，即指马氏兄弟，他们肆无忌惮地贩烟，政府法令对其无任何约束。武威向为烟土汇聚之区，“自禁烟后，因有特殊情形之武

力操纵，贩运为公开之秘密，地方主管禁烟机关置若罔闻，至于该县城乡摊贩出售烟棒，行同出售官膏”。古浪县大靖、土门为该县的著名产烟区和烟土市场，又为通往宁夏的要冲，烟土自然很多，贩运极为普遍，然“一般人民因怕特殊势力之谴责，不敢告发，故无法查究”。民勤县“居民因惧特殊势力起问罪之师，并噤若寒蝉，不敢告密，故无法探究底蕴”<sup>[16]</sup>。

戴建标在检查完河西禁政后，颇为激愤地说道：“烟土在军阀时代，为军阀敛钱之泉源，故特殊情形地方之禁政，其废弛状态，可以不言而喻”。言下之意，河西地区的禁政成效不大。为何会有如此结果呢？他将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主其事的县长。在武威督察期间，他再三督促县长陈邦启将售烟犯法办，但“陈县长频频摇其手曰：‘办不得’”。在登记民间存土方面，戴建标声称多次催促，但“陈县长迟滞未行”。总之该县办理禁政“毫无成绩”。古浪县长“穆云亭对于禁运禁售不闻不问”<sup>[16]</sup>。戴建标痛心疾首地指出：“负有禁政责任之各级县政人员，为迎合特殊情形之环境，以一切禁政法令，置诸不理，甚有多数不肖县政人员，借口特殊情形，亦从中渔利，是以河西禁政，益不堪闻问”<sup>[15]</sup>。诚如马丁·思所说：“在某些地方，地方官员准备采取措施禁烟，但他们不能阻止走私和鸦片贸易……对许多地方官员来说，军队是惹不起的，如果派一个小分队去缴获鸦片，无疑是让他们去给土匪和军阀送死”<sup>[17]</sup>。河西禁政处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中，难得成效自在意料之中。

作为组长的戴建标只有监督权，而无执法权，常常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赤手空拳，如行满地荆棘之途，虽略为披荆斩棘工作……仍以不能铲尽荆棘，不胜力不从心之叹”。在工作举步维艰的情境下，他不禁深感失望，请求辞职。他在给省府的报告中说：“组长猥以菲材，蒙派督察国内著名有特殊势力笼罩之河西，受命之前，自知不能胜任，曾一再恳求免派，未邀核准。组长为服从命令起见，勉力首途，经过三月之奔波……虽做相当工作，无如各县特殊势力庇护，除禁种已无问题外，对于禁运、禁售、禁吸，要办理彻底，均成问题。组长赤手空拳，焉能达到任务。拟请钧长向中央调派得力团队协助，庶克完成使命。如无得力团队协助，则组长已尽最大督察之心，再无善法推进矣”<sup>[18]</sup>。但省府碍于无相当人选，让其继续勉力督察。

通过戴建标的描述可知，河西的禁政除禁种取得了成效之外，其余在禁运、禁售和禁吸上均效果不彰。进入20世纪40年代，甘肃省加大了禁绝毒品的力度，

且随着“青马”军队退出河西和中央军进驻,禁政因之渐有成效。运售有所收敛,由公开转为秘密。同时,随着烟价的高涨,烟民吸食受到限制,自动戒绝者不在少数,一些沉沦不能自拔的瘾君子也因畏惧法令,转为秘密偷吸,影响渐弱。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烟毒的泛滥,给正常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创伤。对于这一后果,“青马”军阀难逃其咎。“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此地纵毒自肥,是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彻底控御所致。南京政府虽时刻不忘分割、瓦解和消灭西北诸马,但诸马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厚统治根基,使其难以动摇,无奈只能采取既打又拉的态度,对其在河西地区的大肆纵毒视

而不见。更进一步讲,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的毒品没有得到彻底的禁绝,国民政府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说:“在败给共产党逃到台湾之前,蒋介石在统治中国期间,与鸦片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日本人在鸦片方面没能做到的事,他全做了。……蒋介石知道,如果他控制了鸦片,他就能筹措军饷”<sup>[17]</sup>。事实的确如此,蒋介石政府受财政支绌、内忧外患的影响,在毒品问题上一向态度暧昧,其所采取的“禁税并重”、“寓禁寓征”政策,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毒品的巨大利益。正由于此,毒品禁绝难得彻底。在此情势下,地处西北的“青马”军阀也就有恃无恐,利用毒品大发横财,祸国殃民。

#### 参考文献:

- [1] 李扩清. 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M]//萧铮. 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26461-26462.
- [2] 高良佐. 西北随记[M]. 雷恩海,姜朝晖,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3]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M]. 李正宇,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4] 明驼. 河西见闻记[M]. 达浚,张科,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26.
- [5] E A 罗斯. 变化中的中国人[M]. 公茂虹,张皓,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58-159.
- [6] 马晓余. 二十年张掖商贩运鸦片侧记[M]//邓明. 晓余文集.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200.
- [7] 陈庚雅. 西北视察记[M]. 甄曦,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72.
- [8] 肃州经济概况[J]. 甘行月刊,1941(3):53.
- [9] 张治中.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62-563.
- [10] 李扩清. 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M]//萧铮. 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26414-26415.
- [11] 1939年甘肃省各区烟民总比较表[R].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 [12] 天涯游子. 人在天涯[M]. 杨镰,整理.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71.
- [13] 侠. 甘肃宁夏之烟祸[G]//陇钟言论集(第1集). [出版地不详]:陇钟编辑社,1932:131.
- [14] 约瑟夫·W·埃谢里克.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M]. 罗清,赵仲强,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0.
- [15] 1940年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督察河西各县局禁政工作总报告书[R].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 [16] 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督察武威县、古浪县、永昌县、民勤县、张掖县禁政工作报告表[R].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 [17] 马丁·思. 鸦片史[M]. 任华梨,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183.
- [18] 1940年第四组组长戴建标报告[R].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责任编辑 程 莘)

## The Rule of "Qingma" Warlord and Drug Spread in Hexi Corridor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 Jif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From 1931 to 1942, "Qingma" warlord stationed huge forces in Hexi Corridor, and forced the masses to cultivate opium poppies to collect taxes. Therefore drug spread in Hexi Corridor. Owing to the resistance of "Qingma" warlord, "government decree of forbidding opium" was obstructed greatly. The reason why the "Qingma" warlord acted willfully i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cked authority and could not control the local powers.

**Key words:** "Qingma" warlord; Hexi Corridor; drug; government decree of forbidding opium